

2020 年第 2 期总第 34 期

财经参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主办



财经参考

2020 年第 2 期·总第 34 期

国际财经

疫情对全球制造业未来趋势的影响.....	1
战疫增长模式下，如何评估经济状况.....	5
疫情后，全球将迎来大萧条还是大逆袭？(上下).....	8

国内财经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	16
“三权分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式的创新.....	19
疫情对中国供应链优势的影响.....	24
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这场疫情可能有三种结局.....	27

新闻快讯

综述：数据显示封锁措施重创英国企业 经济陷入“数百年”来最严重萎缩.....	30
原油价格战走向落幕.....	31
《焦点》美国股市大反弹的背后：大型科技股过度受宠令人不安.....	32
抢时间补进度稳经济举措多路并进.....	33
综述：美国第一季 GDP 或创逾 10 年最大萎缩幅度 结束纪录最长扩张期.....	34

财经参考

国际财经

疫情对全球制造业未来趋势的影响

来源：爱思想网(2020-04-13)

作者：黄奇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清明节期间，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已过 130 万人，疫情带来的全球各国封城、封国，阻断人流物流，阻断交通运输（人类至今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唯一的手段就是隔离），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其后果不仅可能全面超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超过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一、传统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抗风险能力弱，需要调整。

近三十年，全球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产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按水平分工的理论把产业链中一些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外包给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于是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上千家企业可以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而跨国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制造，也不搞产成品的总装。他们抓住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收款清算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过程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了资源配置，实现了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水平分工这一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率先系统阐述的。这一理论体系影响了最近二十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产业链上各类企业不分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优势进行水平分工是十分合理的，有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但是，实际上地球是圆的、世界不是始终那么平的，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势必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整个产业链断裂的风险。由于水平分工产业链的单纯逐利，导致链上每个环节都已经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把产业链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转到了极致，所有链上成员都沾沾自喜于平稳运行时期的水平分工全球产业链的高效率，却很少考虑一旦发生全球性事件时这样极致运行的产业链蕴含着的巨大风险。诚然，一个局部性事件并不会全面影响原有产业链的平衡，如果一个地域生产企业停滞，产业链会自动到全球其它地方寻求替代。但是，一旦遇上人类社会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会打破

紧绷的全球水平分工产业链平衡，信息阻断、物流停滞，让原来不同地域协同生产的优势瞬间转变为劣势，过大的物理距离把产业链分割得支离破碎，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倒退。

面对危机，我们应该从全球化发展的更合理的趋势来反思全球制造业这种生态十分脆弱的产业链水平分工。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疫情就去搞民粹主义、搞每个国家或地区狭隘的自我独立、搞自主循环的封闭制造、搞逆全球化，这些都是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风平浪静的，全球性大范围的产业链分布是不安全、不科学的，如何既能实现产业链全球化水平分工，又能避免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呢？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二、产业链集群所带来的产业垂直整合更有利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

水平分工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制造时代的典型生产关系，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产业链集群是数字时代的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在一定地域内的全球化水平分工，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也就是说，产业链集群依然要发挥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特点，而不是由一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搞整个产业链体系；也不是一个地区自力更生、肉烂在锅里，让本地企业大包干儿、做整个产业链。产业链集群还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分别来生产产业链上的零部件、半成品以及最后的产品集成总装等，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每个集群内的企业虽然在某一个地域干活，但是利益是全球共享的。所以，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并不矛盾，而是逻辑合理的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产业链集群与传统的水平分工的区别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而是要选择合适的地区，在 1 小时到 3 小时车程半径内（50 公里 - 200 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上中下游 70% 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通过产业链集群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本，缩短物流时间，提高物流调度效率，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疫情灾难的冲击，通过集群化极大地强化了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三、产业链集群的形成也是价值链重塑的过程，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还要注重产业整体价值链的重塑。所谓价值链包含了产业链制造系统的上游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环节，和中游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第三方物流、仓储、产业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等等，还包含了产业链下游的消费清算、售后服务等环节，是产业链中的所有价值增值环节的集成。这些价值增值体系原本可以游离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链接。但一旦产业链集群基地形成，营商环境良好，能够与当地产业链适配的价值链上的企业也会自然而然地集聚于此。

当一个制造业的产业链集群形成后，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节约时间和协同成本，就会将它的研发基地、零部件生产厂、整机装配厂转移到此处。如果该地区能够降低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些跨国公司甚至还会将销售清算企业也转移到这里来，其它服务贸易类、产业链金融类企业也会应运而来。产业链集群+价值链集群的双重集群更能有力抗击灾害和其它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的产业调整，世界其它各国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

产业链+价值链的集群，也为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更容易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模式、协同模式和服务模式，从而为整个产业创造新的价值空间。比如挖掘机市场在徐州附近聚集，也会带来大量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他们与挖掘机产业链融合，就会改变挖掘机产业的盈利模型，创造该产业大量新商业模式，这就是集群之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财富。

四、产业链集群所在地要由市场来配置，是企业的选择而不是行政官员的意图，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产业链集群会集聚在哪一个地区，不是地方政府的长官意愿，而是根据市场需要，既要考虑“销

地产”、“产地销”的要求，又要考虑交通物流条件、地区开放程度、人才配置条件等问题。

产业链集群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是两种不同的经济逻辑。“产地销”是以产业链集群地为核心，打造销往全球各地的区域产业链产品。这类产业链产品往往具有轻小、附加值高、对物流运输和距离不敏感等特点，可以在某一地点进行生产并出口全球，不用过多考虑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如集成电路、手机、电脑、软件产品、文化产品等。“产地销”的产品分发渠道主要是航空运输，也包括数字网络渠道。“销地产”是指聚集的产业链集群生产的终端产品主要用于本地销售，如汽车、挖掘机、推土机等重型产品。该产业链聚集应该在计划的销售区域直接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立集群，从而大量减少物流运输成本、本地创新成本、售后服务成本等。

能够承载产业链集群的区域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是各个国家、各地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方向。这样的区域（城市）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1. 交通运输枢纽地：产业链集群需要便利的交通以降低物流成本、人员协同成本，所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形成全球化产业链集群的基本条件。

2. 劳动力和人才的配置：一个地区在教育上的投入会在将来决定这里会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集群，百年树人，劳动力和人才配置是一座城市竞争力的根本体现，需要行政负责人具有长远眼光给予投入。

3. 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由于产业链聚集依然是国际化的水平分工，因此需要聚集地具备支撑国际企业入驻的营商环境。

4. 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良好；产业链集群发展的人文需要也非常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素质的社会环境，更有助于吸引全球产业链资源的聚集。

5. 拥有生产成本优势：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创新成本、税收成本等，一旦形成了产业链聚集，本地域的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在产业链聚集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需要当地政府在各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降低成本。

具备这五个基本特征的区域，需要系统地思考本地既有产业链的特点、周边其它产业链聚集区的分布等信息，从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尽可能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价值链。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域，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五个基本特征，可以围绕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大力布局相关产业链集群。其它地区也要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形成不同规模的产业链集群。

五、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创造适合产业链集群发展的营商环境。

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不能是靠行政权力“强扭的瓜”，而是应该由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自然选择市场资源配置而形成的，政府应该为此做好开明的配套服务。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因素，国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就在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这一规律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也是世界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大家发现了我们原本的全球化模式在太平时期没能暴露出来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中国及世界各国都应该对“世界是平的”思想影响的全球产业化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并做出调整。但是，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也不可以直接进行强硬调整，推行逆全球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错误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辩证式地螺旋上升，而不是 180 度大转弯。

所以在疫情稳定的地域，会率先开始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从硬环境到软环境，从基础设施到人才队伍，适应全球化产业链集群需要的营商环境的打造

是对地方官员面向未来执政能力的考验。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占了全球制造业 30% 的份额，制造业也占了中国 GDP 的 30%。我国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产业链集群化的趋势下，我们既面临机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水平分工下的全球各国加工的产业链的基础是低关税；形成水平分工又能集群化扎根于一个地方为全球服务的产业链集群的前提，不仅仅是低关税而且是零壁垒，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所以只有更深度、高度、广度的开放才能救世界、才能让世界摆脱困境，才能让世界共享新的利益。

为了更好形成产业链集群的营商环境竞争力，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放宽金融服务等领域准入条件，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要进一步改善各级政府的服务能力，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改革开放的高地，推动围绕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改革，并与各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发展。

六、并不是所有产品类别都可搞产业链集群，要根据区域特点慎重规划选择。

产业链集群是垂直整合的国际化水平分工，事实上，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需要建立产业链集群。比如，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虽然也都有自己的产业链，但是产业链的分布大都较为分散；有的产品甚至只在某些固定地区存在，并没有必要形成产业链。

对那些物流链、产业链较短的大部分低端产品，每个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场需求的自然分布，布局的自由度很高。对这种产业的竞争，政府只要做到低税收、贸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建设专门的产业链集群。

但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国家支柱产业等重点产业，必须形成从研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产业配套的全产业链集群，从而大大提高这些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此外，大量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需要重塑，有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链集群。只要这样的集群价值空间足够大，一个区域都可以考虑选择在这一方向上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2020 年 3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宁波舟山港率先恢复生产，对推动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物流体系、恢复全球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要未雨绸缪，关注境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货物航运带来的影响，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就是对建设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的具体指示。

上述的六点讨论，是对过去三十年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化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反思，是全球各国的跨国公司都值得重视的趋势。这种反思调整，绝不是逆全球化，绝不是民粹主义的自我封闭或者自力更生，而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形成既发挥水平分工的合理内涵，又发挥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运费、低运时、低风险、高效率）的区域优势，既发挥 WTO 和 FTA 关于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产业链集群所在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最终，产业链集群基地的形成将是跨国公司和产业链企业自主的选择，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国家行政管制的结果。

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因为疫情的隔离阻断、因为冷战或贸易战的对立，妄言全球化结束是短视的，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

战疫增长模式下，如何评估经济状况

来源：财新网(2020-04-15)

作者：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一、不能低估第二波冲击，转入战疫增长模式后以相对增长率评估增长状况

今年年初中国经济首先受到疫情冲击，一个多月的时间经济几乎停摆，目前已在逐步恢复。但海外疫情正处在上升焦灼状态，总体上仍未出现拐点。

WTO 最新估计，2020 年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遭受剧烈冲击，增速将会下滑-2.5%至-8.8%，出口增速为-17.1至-40.9，进口增速-14.5%至-33.8%。

中国出口一季度同比下降 11.4%，进口下降 0.7%。二季度以后，预计海外疫情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加大，将会成为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波冲击。有关研究推测，中国进出口全年将会出现 15%-20%的下滑，其中服务贸易降幅更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净出口在 GDP 中的占比较低，只要净出口不出现大的负增长，对国内增长影响有限。这在正常增长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出口短期内下滑幅度过大，导致大批出口企业停工停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消费、投资和就业。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可以看出，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影响到 0.2 个百分点左右的 GDP。近期有关信息显示，外贸企业订单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已经出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出口从高点下降了 30 个百分点，带动 GDP 下降了 7 个百分点。

第二波冲击何时缓解，直接取决于国际疫情走势，而国际疫情有三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一，美欧日等国一段时间后出现拐点，但在现有管控模式下，可能难以像中国一样短期内清零，会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尾部；第二，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爆发期；第三，疫情是否会跨年度甚至长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第二波冲击在时间上将会大大长于第一波冲击，带来的增长减值也大概率超过前者。

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全球疫情结束不取决与疫情结束最早最快的国家，而取决于最差的国家，因为我们处在相互关联的同一个地球。

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并适应这一个现实，即从常规增长模式转入相当长时期的“战疫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需要支付一个“战疫折扣成本”，就是说，总是要拿出部分资源去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经济难以开足马力运转，实现潜在增长率。

这样，2020 年的增长背景就出现了很大改变。一季度预计会出现-5%的收缩，二季度恢复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在不考虑第二波冲击的情况下，假设三四季度受到反弹和刺激因素的支撑，较潜在增长率高出两个百分点，达到 8%左右的增长，但若考虑到第二波冲击影响，要有 2-3 个百分点的减值，

全年能够实现 3%左右的增长，就是一个很大胜利。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背景下，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非常难得。可以说，“战疫增长模式”下 3%的增长率，含金量要大大超过常规增长模式下的 6%。

对增长目标的评估也要相应调整。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就是用中国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采取这种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国经济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这次疫情冲击也是全球性的。与以往相比，如果这种比值是稳定或上升的，表明中国经济表现是好的，反之则是差的。以差值为例，2019 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 2.9%，中国是 6.1%，相对增长率为 3.2%；如果 2020 年世界增速为 -2.5%，中国为 3%，相对增长率就是 5.5%，是高于去年的。

这种评估方法的一个好处是，不必过于拘泥于以往的增长目标，特别是避免用过度刺激办法去实现常规增长模式下制定的目标，而是在战疫增长模式背景下，科学务实地制定并实施增长目标。

二、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发直接补贴不能是毛毛雨，要给救助第二波冲击下的外贸受困企业留下足够弹药

短期政策要与这次经济受冲击的特点相适应。这次经济大幅下滑，是一次意外的超级外部冲击，而非经济内部出了问题，如需求严重不足、杠杆率过高等。这是与以往金融或经济危机的不同之处。

经济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生产能力受损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长，生产能力受损有限，疫情过后可出现 V 型反弹；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或生产能力受损严重，反弹就不那么容易。除了尽快控制住疫情之外，尽可能减轻生产能力受损，保护生产力，是短期政策的重点。

短期政策要聚焦于“恢复”、“救助”“避险”。恢复就是把中断了的供求重新连接，有人强调扩大需求，其实当务之急是恢复需求。救助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甚至日子过不下去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避险是要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重点是防止金融体系由于流动性紧张引发的停摆和混乱。

从这个角度说，财政政策重点是救助，国家已决定发行特别国债，所筹资金应主要用于救助。货币政策的重点是避险。应该说，这次美联储反应相当快，通过提供充足流动性稳定预期，防止金融体系的混乱乃至崩溃。当然，代价也很高。中国央行采取了积极有效政策，三月份的金融数据已经出来了，可以看到社融指标大幅上升。当实体经济突然减速、几乎停摆的情况出现，只有加大注入流动性，才能保障经济的连续运转。但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的区别是，二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增长潜能，刺激经济主要靠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政策，所以，中国应该也有能力使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状态，而不必跟随去搞负利率。

短期政策有三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以往遇到经济下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花钱搞投资，特别是搞基建投资，这与当时的增长阶段和经济结构有关。2008 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行四万亿刺激计划，当年支出法 GDP 增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为 62.8%，消费比重为 42.5%。到了 2019 年，支出法 GDP 增量中，投资比重已经降为 17.2%，消费比重则上升到 66.9%，居民消费比重为 49.5%。这组数据表明，现阶段要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这个大头稳不住，经济整体就稳不住。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已经成了小头，靠小头稳不住大局。

第二，对低收入群体直接补贴。这是稳消费直接引出来的议题。到底是直接发放货币补贴还是发放无太多限制的消费券，还可以讨论。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直接货币补贴，直接就发到居民账户上去了。我们的短板是低收入人群识别和补贴的基础设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数字技术发展到目前水

平，搞这个“新基建”应该不难，当下的需求也提供了一个补短板机会。短期内，可以利用已有的渠道信息，如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城市社保体系中的低收入人群、个税申报系统等。这种补贴至少要注意三点：确实补助到低收入人群；尽可能多地去消费；不能走形式，下毛毛雨，要有适当大的量，比如达到低收入人群一个月的收入或消费水平。

相关的一个认识问题也要讨论。不能简单认为对低收入人群直接补贴就是给福利、养懒人。直接看，发补贴可以稳消费、稳增长，部分补贴将转化为企业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从经济循环过程看，给低收入群体发补贴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保护生产力，提升人力资本，因为低收入群体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是人力资本提升空间最大的生产者。

第三，要给第二波冲击下的外贸受困企业留下足够弹药。救助企业的资源要均衡使用，子弹不能一次打完。第二波冲击刚刚开始，峰值和尾部在什么地方还看不清楚。出口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部分，如果这部分企业倒下，对中国经济的伤害难以估量。要把救助资源的大头放在这个领域。

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也可与救助外贸企业结合起来。对外贸受困企业中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员工，由政府发放一定数量的补贴，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这样就可以同时扩消费、降成本、稳就业，使政策更好地起到作用。

三、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以要素市场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即使经济恢复较好，仍会留下一个增长硬缺口。前面提到的“战疫成本折扣”，也要有新需求填补。如何激发新增长动能，是与短期政策相配套的中长期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

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用一句时尚的话语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所谓都市圈，在空间形态上，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 50-70 公里左右范围内（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概括地说，都市圈发展，重点是那个“圈”的发展，通过疏解核心城市的结构性矛盾、扩展城市化空间，小分散、大集中，实现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转型升级。具体说，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制造业在降成本的基础上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大幅度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有利于职住平衡，减缓拥堵、污染和通勤压力；有利于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改进居住条件，获取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带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促进生产生活转向高质量、可持续、有韧性的新发展方式。

从增长动能角度看，小镇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小镇小城之间要用轨道交通等连接，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也要有新的产业投资，这些不仅可以带动消费，也可带动大量投资。初步估算，今后十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 0.5 到 1 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期热炒“新基建”概念，从体量上说，基建投资的主体还是所谓的老基建。其实，不论老基建还是新基建，投对地方都是好基建。基建投资的突出问题是投的地方和机制不对。投到都市圈，出错的概率不大。

回到现实，都市圈建设面临不少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方面的阻力与约束。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核心是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文件发布后社会反应积极热烈，对解决都市

圈建设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政策问题，可以说恰逢其时，切中要害。这也再次说明，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建议以落实中央文件为契机，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包括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并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充分的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定规划，并着手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为外来人口在都市圈小镇小城安居乐业、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若干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疫情后，全球将迎来大萧条还是大逆袭？ (上下篇)

来源：FT 中文网(2020-4-14，2020-4-17)

作者：夏春(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疫情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宏观经济和大国关系的冲击，正在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广。

首先，疫情叠加上油价暴跌，对固定收益市场的高杠杆、外汇市场的利差交易、股票市场的基本面投资、以及各类拥挤的量化策略造成协同冲击，造成除美元外的资产无差别下跌，回撤 20% 进入熊市并累计下跌超过 30% 的速度史无前例，超越了 1926 年有日度交易数据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

其次，应对疫情的隔离措施，已经毫无悬念地带来全球经济衰退。看点只不过是中國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高于还是低于 -10%，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和 -30% 的差距等等。众多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专家认为未来的经济衰退程度将会是二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必然超越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大衰退”，而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全球经济会不会重复 1929 年开启的“大萧条”。

最后，在各国迅速协调一致，采取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约占 GDP 比重 10% 的财政救助计划化解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和减缓对经济基本面的冲击之后，大家的关注焦点转向了疫情对于大国关系的冲击，在国内，逆全球化，中美脱钩等一致性偏悲观的观点极为盛行。

因为三个原因，本文尝试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猜想。第一，虽然近期许多观点非常有价值，专家和权威们会带来基于数据而不是仅凭直觉的判断，但是恕我直言，以我的有限阅读，大部分观点仍然拘泥于教科书或者说传统智慧，自我设限，很少跳出原有的概念和思维框架。

第二，各项研究都显示专家和权威预测准确度极低。近期，大家过度重视部分权威近期发表了悲观的意见，却忘了他们在三年前均作出重大误判。例如前联储主席耶伦在 2017 年表示她相信在有生之年不会看到金融危机重演，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在 2017 年初严重不看好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在 2020 年初又转为极度看多。

而写出《黑天鹅》一书，说出“在重大历史事件的预测上，专家的准确度就是零”的统计学家塔勒布，基于人性和资产价格概率分布设计的策略，在 3 月实现了超过 36 倍的回报。没错，他的策略也是过去历次股灾的赢家。

第三，我们一定要警惕“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专家们都预言中美矛盾会继续扩大，脱钩无法避免，反而可能加大这一结果的发生。如果大家熟悉历史充满意外，就应该放飞思想，多一些开放式的思考。

大流感发生时，你应该悲观还是乐观？

近期围绕“大萧条”争论的观点几乎都可以从教科书找到，但是教科书很少记录的背景却论者寥寥，假如我们多一些想象力，回到大萧条开始前，可能就会对目前的一致性观点重新思考。

7000 万军人卷入 1914-1918 年的一战，1000 万军人和 700 万平民死亡，军人们在战争上甚至没有头盔，和目前一些国家前线医护缺乏基本保护设备类似。战争结束后，西班牙大流感从 1918 年持续到 1920 年，大约 5000 万到 1 亿人口死亡。

1918-1919 年美国发生持续 7 个月的经济衰退，衡量商业和贸易活动的指数（下面简称 GDP，正式的 GDP 和失业统计开始于二战之后）累计下跌-24.5%。衰退结束后 10 个月，1920-1921 年美国再次进入长达 18 个月的经济衰退，GDP 累计下跌-38.1%。我相信，大家有绝对的理由保持悲观。

然而，美股却在 1918-1919 两年上涨了接近 70%。强调一下，这还是在美国医疗机构无能为力、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还是“一群废物”（借用经济史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形容）的情况下出现的。不过，1920-1921 年的经济衰退的确打击了美股，下跌超过 40%又回到了 1918 年初的水平，历史常常出人意料。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今年 3 月美股的持续下跌使得道琼斯指数回到了 2016 年底特朗普赢得大选时，历史再一次相似。现在我问大家，这个时候你应该对经济和资本市场乐观还是悲观？

让我们暂时忘掉专家和权威的悲观预测，回到背景非常类似的 1921 年。乐观的人成了大赢家，1921 年底到 1929 年 10 月大萧条开启前，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500%，历史学家将这十年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同期在德国被称为“黄金的二十年代”）。

当你了解这来源于战后基础设施重建，福特汽车流水线生产创新以及其他制造业变革，以及当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刺激等、或者在阅读小说或者观看电影《伟大的盖茨比》时，认为当时经济一片繁荣，股市投资轻而易举时，你就错过了教科书没有告诉你的事实：1923-1924 年连续 14 个月，美国 GDP 累计下跌-25.4%，1926-1927 年连续 13 个月，GDP 累计下跌-12.2%。历史充满意外，预测从来很难。

今天，当我们把焦点都放在“大萧条”三个字上时，我们的思维就都被局限住了。1929-1933 年连续 3 年 7 个月的衰退，GDP 的累计下跌其实仅有-26.7%，1937-1938 年连续 13 个月的衰退也只造成了-18.2%的 GDP 损失。

这些数字和上面提到的相比，并没有特别让人震惊。1929 年前美国国家经济统计局公布的 22 次经济衰退，GDP 累计跌幅超过-26.7%的，就有 7 次，GDP 累计跌幅少于-18.2%的，只有 6 次。

经济学对衰退和萧条的区分其实前者时间短，后者时间长。连续 6 个月 GDP 增速为负就是衰退，而萧条通常延续数年。如果说 1929-1933 年的衰退时间超长，那它也远远落后于 1873-1879 年长达 5 年 5 个月的萧条，不及 1839-1843 长达 4 年的萧条。

大萧条为什么特别？

“大萧条”之所以如此特别，成为大家比较的基准。我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后人给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而我前面提到的 22 次衰退和萧条，几乎都被人遗忘。

第二在于 1929-1933 年股市最大回撤-86%，1926 年之前美国股市的存在感很低，也没有日度价格数据，规模更大的衰退和萧条也没办法通过股市暴跌来吸引关注，彼时由于世界经济联系有限，衰退和萧条也仅仅局限于一国。特别强调一点，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 1929 年股市最高点之前，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美股将永远保持在这一高原！随之而来的暴跌让他的名声严重受损。

第三当然是经历了“咆哮的二十年代”后，发达国家来往密切，使得衰退如病毒一样变得一损俱损，当时各国在金本位制束缚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均以紧缩应对衰退，外加重商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关税战，导致全球同步陷入萧条，并且为人类留下了最大的伤疤：二战。

第四在于大萧条持续时间漫长，虽然罗斯福新政让美国经济从 1934-1937 年进入正增长，但是失业率从 1931-1940 年保持在双位数，因此给人留下了大萧条持续了十年的感觉。

就在美国从 1939 年走出大萧条，进入二战拉动的长期繁荣之前，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作为当选主席，在前一年的美国经济学协会上发表了悲观预言：美国将进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我相信这代表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的观点，这不过是为专家预测不准多一个例证而已。历史充满意外，预测者应当保持谦卑。

别为“大萧条”较劲

也因此，当下认为“大萧条”将重现的专家，倾向于强调疫情在短期内带来的 GDP 和失业冲击，全球经贸隔离造成超越一战和二战期间的“闭关锁国”，以及未来大国经贸和政治关系的长期紧张，认为逆全球化、文明的冲突、甚至“修昔底德陷阱”难以避免。

相反，反对的声音则强调大萧条之后宏观经济学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重新理解和执行，美国金融监管、存款保险制度、和社会失业保障体系的建立以及在全球的复制，尽管仍然充满缺陷，但可以阻挡疫情发展对全球经济的破坏。特别是，美国过去为衰退出台经济救助方案，平均耗时 7 个月，而这次仅仅用了 7 天时间。即使是一些长期批评美国政府的诺奖得主如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也对救市速度和规模表示赞赏。

值得一提的是，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实际上是罗斯福新政和二战证实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凯恩斯的思想启发了罗斯福。在 2007-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学家对于宏观经济学取得的成就格外自豪，特别给战后的经济发展取了一个名字“大调和”（Great Moderation）来自我标榜。因为二战后到 2007 年之间，美国 10 次经济衰退平均持续期只有 10.4 个月，美国发展一枝独秀，美股牛长熊短。

只不过，2007-2009 年金融危机，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是“大衰退”，让没能提前察觉的经济学家黯然失色。好在这次衰退也只持续了 18 个月，期间 GDP 累计下跌了-5.1%，失业率 10%，股市最大回撤 58%。和二战后历史相比，这个衰退的“大”，主要体现在股市上，而 GDP 下降程度和二战前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我认为，两种观点并没有本质冲突，如果暂时不考虑疫情带来的国家之间关系的长期影响，那么一场持续时期超过 2007-2009 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发生的概率超过七成。我之所以对这一预测有相当程度的保留，除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救助方案迅速推出以外，作为先行指标的股市表现，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虽然下跌迅速外加 4 次熔断，但今年美股在 2 月中旬到 4 月上旬单日下跌超过 5% 的天数，仅有 5 次；而这一指标在 1929 年 10 月下旬到 12 月中旬差不多同样时期内，出现了 9 次（当年没有熔断制），在 2008 年 9 月底到 12 月初，出现了 11 次。

当然，我也可以找到一些“新鲜”的指标来为大萧条的预言加分。比如美国一家游戏产品制造商发现，他们生产的拼图在社交隔离开始后两周销售额同比飙升了 3.7 倍，每分钟卖出近 20 套，最接

近于大萧条时期的表现。

我特别认为没有必要为了“大萧条”三个字较劲，完全可以多一些想象力。虽然“末日博士”鲁比尼预测的“更大的萧条”（Greater Depression）更吸引眼球，结果可能会是“更大的衰退”或者“小萧条”（Lesser Depression）。或者我们可以效仿一战和二战的叫法，把 2020 年开始的这次经济衰退叫做“第二次大萧条”或者“第三次大衰退”都未尝不可。

如果要我回答前面的问题，当下我们应该对经济和资本市场乐观还是悲观？我的看法是：经济前景未必那么悲观，而资本市场未必那么乐观。我当然非常清楚预测很难。

“大停滞”的核心特征不是经济不增长，而是长期低利率

一个好的名字确实可以让记忆恒久远，而且西方文化特别喜欢“大”（Great）这个词，又不太愿意重复。将来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独立的名词来形容 2020 年开始的严重经济衰退，我觉得一个可能是“大停滞”（Great Stagnation）。

这个灵感其实并不新鲜，它恰恰来自于前文提到的，1938 年汉森提出的“长期停滞”论。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在 2013 年把这个概念重新挖掘出来，作为理解美国和全球经济和失业率在“大衰退”之后复苏非常缓慢的深层原因（如果以危机发生前的美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来衡量，美国 GDP 直到 2018 年才完成了 V 型反弹，回到了长期趋势线上）。

他特别强调：由于老龄化等一系列难以改变的经济内在结构性原因，现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特别是在难以实行负利率的情况下，充分就业、让人满意的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三者长期难以同时实现。即使实行了负利率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达到了充分就业，他们的经济增长也接近于停滞。如果要满足前两个目标而实行零利率，就必然带来投资者高杠杆，使得金融市场风险加大。表面上看，“特朗普经济学”同时完成了三个目标，但资产泡沫仍然破灭了。

之所以这么麻烦，根源在于老龄化社会导致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家庭和企业宁愿选择储蓄，而不是投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戈登在 2015 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兴衰》一书指出美国劳动生产率（代表科技进步对 GDP 的贡献）长期趋势往下，未来的科技进步很难超越工业革命、电话、电缆、飞机、互联网对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改进。

除了众所周知成功的投资案例，更多的资金被用于无效投资，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储蓄大于投资成为常态，伴随而生的则是这些国家的低通胀率。理论上，利率需要降到零以下才能够吸引投资，刺激增长。但负利率在老龄化严重的欧洲和日本都不成功，也许负得还不够多。

而宽松政策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又进一步压低了消费和投资需求，全球陷入到一个陷阱。作为外来的疫情，只不过是引爆了经济的内在矛盾而已。

除非我们有办法让老龄化降低、出生率提高、贫富差距缩小，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长期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资产泡沫，偶尔的技术驱动投资会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但难以长久。

请记住，“大停滞”最核心的特征是长期低利率，而并非经济停止增长，也不是资产价格低迷。萨默斯的观点提出后，之所以遇到很多反对声音，就源于 Stagnation 这一单词的选择。如今经济学界夸奖他的先见之明，就在于长期低利率成为了共识。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英文单词表达这一含义。

“大衰退”带来了通货紧缩的压力，过去十年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抵消，无法推升通胀。疫情当前，通缩压力仍然大于通胀。如果闭关锁国持续会引发物价上涨，而央行对于通胀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例如等到通胀回升到 3% 并保持一段时间才开始加息，就有助于化解过度储蓄、投资不足的问题，从而走出恶性循环，告别“大停滞”。

全球在应对疫情中采取了协调一致，基本占比 GDP10%的财政救助方案，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固然值得担心，但假如救助只是抵消通缩，而没有带来麻烦的话，那么可以鼓励过去拘泥于债务负担或上限而投资不足的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就有可能走出“大停滞”。

前文提到，如果暂时不考虑疫情带来的国家之间关系的长期影响，我们会看到一场严重衰退，但未必比得上“大萧条”。如果放弃这一假设，我们可能会迎来什么？相对于目前比较一致的偏悲观预见，本文下篇将讨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大逆袭”（Great Reversal）等几种不同的可能。

在本文上篇，我认为尽管新冠疫情产生的“大封锁”（IMF 刚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副标题就是 The Great Lockdown），将对未来 1-2 年全球经济造成严重衰退，并且大概率超过 2007-2009 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实际持续期 18 个月）的程度，但在全球协同一致的货币宽松与财政救助下，并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错误决策下，不至于发展到 1929 年开启的长达数年甚至十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专家们普遍担心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以 Great Pandemic 之名写入历史）将助推制造业产业链回归本土，加大逆全球化潮流和中美脱钩的可能。大家尤其担心这会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拉大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同时给企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面冲击。

这样的担心有一定的依据。中世纪黑死病（又称 Great Plague）肆虐欧洲时，犹太人被错误当作瘟疫传播者而受到迫害。一项研究发现，中世纪针对犹太人的族群迫害在德国分布非常不均匀，当年迫害越严重的德国地区，在 600 年后的纳粹执政时期，以各种形式展现的反犹主义程度仍然更加强烈。

但我依然认为，与其发出一致性的悲观预见，或者仅仅关注短期内的经济救助方案和应对举措，不如借鉴国际学术界关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和“大逆袭”（Great Reversal）的研究成果，既可以帮助我们去洞悉未来可能的趋势，更能够指导我们采取有利于中长期发展的制度变革，以防止潜在的糟糕结局变成现实。

如何防止“大分流”与“内卷化”？

大分流这个概念虽然是亨廷顿在 1996 年提出，但它真正成为专有名词则归功于彭慕兰（Kenneth Pomeroy）在 2000 年出版的经济比较史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书中指出，中国、印度、中东、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富裕地区，在人均收入（以小麦衡量）、寿命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相对于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优势一直持续到 1750 年（乾隆 15 年）。1760 年工业革命开始，西欧国家才赶超东方国家，形成历史的大分流。

这挑战了传统上认为分流发生在 16 甚至 15 世纪的观点，使得关于大分流的大辩论成为历史学界 21 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话题（没有之一），并吸引了各个学科专家的深度参与，让这一概念更具影响力。

彭慕兰认为大分流是历史的偶然/幸运，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英国开采出城市附近的高质量煤矿，作为木材的能源替代品，使得海外贸易、殖民掠夺、技术革新、工业扩张形成正循环，例如美洲新大陆农作物的高产出对欧洲工业发展和土地节约有重大意义（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是《贸易打造的世界》，讲述 1400 年以来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而中国明清实行海禁，而经济富裕和人口密集地区在南方，与东北的煤矿资源距离遥远。

因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陷入了“内卷化”（involution），也就是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历史上，经济停滞是因为规模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技术，使社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学家认为 14 世纪中期开始的黑死病，欧洲战争频繁，以及人们虽然躲进城市，但城市的环境卫生非常

糟糕，三者同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带来劳工工资增加（参考拙著《全球大瘟疫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虽然以小麦衡量的工资增加只持续到1450年，之后持续下跌到黑死病开始前，但以白银衡量的工资在欧洲持续增加，超过了中国）。

于是，欧洲富人阶层推动“城市企业”发展，为了降低劳动工资支出，开发出资本密集型技术来替代劳工，进入到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的生产过程。而中国则继续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模式，由于人多地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企业利润更多被投资到土地上。

关于大分流的辩论很快从彭慕兰关注的经济生产力上的外在偶然因素转移到生产关系、国家制度和能力等内在决定性因素上。

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崛起得益于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欧洲的政治分裂使相互竞争的各国不受单一中心的控制。它为个人的思想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人们可以用脚投票，移居到更自由的国家，活跃的思想在各国顺利传播，而保守势力彼此分裂，无法协调压制。

思想竞争自然发展成为制度竞争，欧洲各国在经济、军事、人才、技术上的激烈竞争，使得政治和社会制度不断改进和提高。这方面，中国恰恰是一个反例，科举考试统一思想，统一帝国在压制反对声音上协调一致，形成超稳定结构，但和平与稳定也造成了军事技术停滞不前。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将成功和失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区分为“包容型”（inclusive）和“榨取型”（extractive）。前者的政治权利广泛分布，有效保障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为不断的创新提供经济激励；后者则反之。

欧洲各国根据殖民地的气候，死亡率等因素分别引入包容型或榨取型制度，对殖民地将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一般来说，相对于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发展更好。

不过，印度因为纺织业上的优势和宗主国英国形成直接竞争，遭到英国的无情打压，英国一方面推动印度的去工业化，另一方面限制进口印度产品（棉花等原材料除外），又强迫印度对英国产品开放市场。这场贸易摩擦是印度在大分流中被甩到后面，今天依然落后的关键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从统计检验来看，和彭慕兰思想接近的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提出的地理假说，并不能单独解释大分流，地理因素只有和制度因素结合到一起，才能说明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彭慕兰的分析对中国和欧洲的科技差距（李约瑟之谜）着墨不足。中国的技术发展依靠直觉和经验，在早期因为人口优势处于领先，但逐渐落后于欧洲依靠科学和实验的体系。中国和东亚国家普遍缺乏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商业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发展，而欧洲科学上的突破，并非单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与军事技术的需求紧密相联。

关于大分流还有很多不同解释，比如经济学家强调和西方社会依靠自治城市不同，古代中国的商业和社会组织注重血缘和宗族关系，内部运行成本低，但规模难以扩张。

再比如社会学家如韦伯强调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赵鼎新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即使明清时期江南有较高的生活水准，但“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科学方法/理性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儒法合一的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商人也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

显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今天面临外部挑战的中国具有重大意义。为避免这次疫情之后可能产生的大分流和内卷化，中国必须在逆全球化潮流下继续保持贸易上的优势，鼓励思想竞争，推动政治权

利的均衡分布，摒弃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加强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富裕阶层投资新科技而非土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不过，我们在看到中国的不足之余，也要探寻中国成功的深层原因。毕竟，在大分流之后，中国历经艰辛实现了大逆袭，从 1750 年 GDP 占全球比重 30% 的第一位，降到 1949 年建国时不足 5%，现在占比约 20% 回到第二位。这就使得前面提到的大家耳熟能详的理论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只能解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失败，却无法解释其成功。

即使 1980 年以来全球不同国家出现了“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的发展趋势，即使有了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些成功的例子，现实依然是大部分国家都没能实现工业化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为什么专家开出的药方基本失灵了？影响国家成功和失败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大逆袭”依靠国家主动创造市场的能力

尽管理论众多，但目前关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大分流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依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同样，为什么中国 1860–1978 年三次工业化革命的尝试均告失败，而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业化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迄今也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今天关于中国经济成就的评价依然观点纷纭，老百姓和专家对于“中国做对了什么”莫衷一是。这也是在疫情带来的挑战面前，大家忧心忡忡的原因之一。

前文提到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优劣论虽然听着符合直觉，但仔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他们夸大了中国和欧洲在工业革命开始前的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大分流之后内生产生的。学者把今天观察到的差异倒退到大分流之前，倒果为因。

举一个例子，纽约、伦敦和香港是现在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之下，巴黎、法兰克福和上海的金融地位次之。于是学者们就指出这些城市在金融发展上的差异是来自于法律制度差异，前者实行普通法，后者实行大陆法（又可以细分为法国和德国两种法源）。这两种法律体系在财产保护，大小股东对待上的区别被放大。这一观点极其盛行，在我居住的香港被视为铁律，认为香港在金融上的领先优势会长期保持。

但仔细检视历史，就会发现法制从来没有连贯性的优势。一战前，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是实行大陆法的古巴，埃及（大陆法）和英国并列第二。一直到大萧条结束，大陆法系国家的金融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而普通法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得益于英法在二战的胜利。即使如此，大陆法系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已经实现了大逆袭，1984 年之后采取德国法律体系的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要高于普通体系的国家。

大数据统计检验同样显示了普通法体系的金融发展落后，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时，就忽视了更多采用普通法但金融发展并不成功的国家。香港成为金融中心更多受益于地理位置和特殊历史环境，其实是偶然的結果。

就我有限的阅读，经济学家文一在 2016 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对于理解英国和中国工业革命成功最具启发性。书中对世界经济史和现有理论进行详细的梳理之后，主张“国家主动创造市场的能力”是工业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

历史学家 Peer Vries 在 2015 年出版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在于指出中国和英国在国家能力上，特别是国家的渗透和谈判能力（深入社会与民众互动和谈判），攫取能力（向社会征税）存在巨大的差别。

文一对此有简洁清晰的阐述：“英国光荣革命并没有使英国政府在与劳苦大众分享政治权力方面变得更加包容。它不过使得英国政府在征税、创造市场、开辟国际商业渠道、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

策、以及全面驾驭英国经济方面变得更为集权和强大而已。”

文一研究最具新意之处在于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与英国工业革命具备高度相似性。核心在于以国家能力创造市场规模，而这可以推动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

经济学里几乎没有“国家能力”这个概念，过去，经济学家也不重视市场的产生过程，认为其是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

换言之，市场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中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重商主义国家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然而知难行易，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顺序错了则满盘皆输。

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相信“决定论”，但文一却和彭慕兰一样得出了“偶然/幸运”的结论：中国在大分流之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失败，无意中发现并遵循了市场创造的正确顺序和方法。

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应对挑战

我认为，这样的新知对于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非常有价值。只要中国继续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就可以形成新技术，产业升级，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继续重视贸易对于市场规模扩大的作用，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尽最大可能降低贸易摩擦对于市场规模的破坏，同时继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全球企业入驻。

疫情过后，即使全球产业链会出现重构，中美出现部分脱钩，中国企业家也要更主动地走出国门，在新产业链建设中争取应有的份额。即使遇到困难，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在管理能力和效率上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

我在《从“斯普尼克时刻”到“华为时刻”，中国企业如何提升竞争力？》一文详细解释了，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力差距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通常认为的制度差异（包括产权、税收、教育、法治、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但却和企业管理能力有着极高的相关性。在资源分配上，市场和管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

中国高质量管理企业的生产效率是低质量企业的 5 倍，制度因素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革，但企业的管理能力却可以在短期内学习提高。这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企业和国家创造价值。

逆全球化背后的两个“大逆袭”

疫情带来的大封锁，与逆全球化的思潮相呼应并不让人意外，我认为有效应对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两个“大逆袭”。

第一、各国在贫富差距上出现的大逆袭现象。我在《全球性疫情能降低收入和贫富差距吗？》一文指出，美国最富有 1% 家庭占有国民财富的比重，从一战开始前的 40% 持续减少到 1980 年的 20%，现在又回升到了 40%。而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税率和全球化变化。从一战开始后，全球化逆转，各国增加最高边际税率以应付战争和福利开支，持续到二战结束后。1980 年起全球化重新启动，各国展开减税潮，富裕阶层实现大逆袭。

贫富差距引发民粹主义后，舆论与政治人物将矛头对准全球贸易，特别是对准获得贸易顺差的中国，而有利于富裕阶层的税率变化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样的偏向性指控并不公平。

第二、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美国，相对于欧洲，完成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大逆袭。即美国市场由过去的企业自由竞争逐渐转向垄断结构，而欧洲市场由过去的企业垄断转向了自由竞争。

如果大家搜索大逆袭，最新的结果都指向经济学家 Thomas Philippon 在去年出版的《大逆袭：美国如何放弃了自由市场？》，详细分析了这一市场结构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过去 20 年，美国监管机构逐渐容忍企业垄断，并大幅降低了违规处罚，而欧洲企业深受美国经济学教科书强调“自由竞争”的好处，逐渐放弃了市场垄断。

然而，美国大型企业在获得垄断利润之后，为了维持其地位，一方面降低了在美国的投资和招聘，一方面回购股票加剧贫富差距，这就使得全球化的好处无法被更多美国人分享，矛盾重重下民粹主义崛起，但矛头依然被错误导向了中国，美国企业和监管机构的责任被忽视。

全球化的矛盾还来自其他层面，我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第四条“断层线”》里分析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难以化解。除此之外，二战后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国际政治和货币体系，欧元区的内在缺陷，社交媒体带来的观点冲突和治理难题等一系列麻烦，都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

疫情和大封锁会给中国企业和大国关系带来冲击，但与其把焦点放在中国即将面对的困难，做出可能“自我实现的预言”，我建议大家把目光放远。美国、欧洲企业，其他国家的政府同样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难题，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和挑战。

疫情终将过去，喧嚣会化为沉思。中国应该吸取大分流和重新崛起的经验和教训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积极主动变革。我们希望变革的并不仅限于中国，每个国家都应该为“逆全球化”对症下药，而非继续推卸责任。我们相信其他国家会看到中国在疫情控制、企业弹性和生存力、产业链整合上的强大实力，大国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仍将是未来的主题。我们期待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逆袭势头，奋勇向前。

国内财经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

来源：爱思想网(2020-04-27)

作者：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20 年伊始，肺炎疫情从武汉开始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以及全世界。如何判断这种情况下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在宏观层面上如何应对，就成为目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本次疫情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肺炎疫情走势判断

经济形势的发展同肺炎疫情走势息息相关。因此，对疫情走势的判断就决定了对经济走势的判断。根据钟南山院士等人的意见，我们对每个季度的疫情和经济形势大致判断如下：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完全处于肺炎疫情影响阶段，企业开工率较低，导致供给下降，同时居民户被居家隔离或自愿选择居家隔离，导致消费大幅度下降；第二季度是肺炎疫情由尾声到彻底结束的过渡期，劳动力大军逐步返城，企业界逐步实现正常开工率，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供给和需求都逐步恢复，但消费需求的恢复较慢；第三季度疫情彻底结束，企业处于加班加点的高开工率状态，弥补前面季度损失的产出，居民生活恢复正常，在消费方面也会存在弥补性消费；第四季度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完全恢复正常。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基于以上疫情走势的判断,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将遇到较大的负面冲击。旅游、餐饮、娱乐等行业损失较大,且基本上不可能在后续季度中得到弥补。第二产业虽然也会受到冲击,但在后续季度可以通过加快进度来弥补。第一产业也会受到负面冲击,但由于第一产业在 GDP 中占比较小,所以总体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同时,由于第一产业涉及食品生产,所以可能对 CPI 产生影响。

笔者预计,由于 2020 年第一季度完全处于肺炎疫情影响阶段,受企业开工率低下以及居民户被居家隔离导致的消费大幅度下降影响,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第二季度随着疫情由尾声到彻底结束,劳动力大军逐步返城,企业界逐步实现正常开工率,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GDP 同比增速开始回升;第三季度 GDP 增速将达到今年最高,大部分企业会采取加班加点的措施来弥补前面季度损失的产出,同时居民生活恢复正常,在消费方面也会存在弥补性消费。第四季度基本恢复正常增长。除此之外,随着疫情预计在第二季度得到控制,国家将再次加大逆周期调节,宏观政策将更倾向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以推动经济发展,如减税降费、降息、降准等,进而弥补在第一季度的经济损失,所以宏观政策也将助力经济从第二季度开始逐渐提升。综合而言,2019~2020 年全国 GDP 增速预计形成一个深“V”型走势,2020 年第一季度降到最低点,第三季度升至最高点,全年整体增速有望达到预期目标。

供给方面,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会大幅度下降。首先,由于 2020 年春节提前,叠加春节假期延长,高基数效应拉低第一季度同比增速。然后,当前针对疫情政府对企业采取延迟开工的措施,意味着国内很多工厂延续假期停产模式,由此将压低工业产出,同时考虑外地员工返工需检查报备等程序,会进一步拖累工业产出。其次,国内很多企业不能如期复工将面临严峻的经营压力,如生产停滞导致货物不能按期交货,资金链断裂等引发的经营困难,甚至企业倒闭,进而牵连上下游企业。后续季度国家或地方政府预计会出台相关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恢复生产,工业产出将逐步提升。

消费需求方面,受疫情影响,预计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疫情过后,在一系列调控刺激政策下,经济生产得到恢复,消费需求会有所上升。一方面,当前受疫情影响,餐饮住宿、旅游娱乐等相关方面的消费短期内有所下行,但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另一方面,虽然疫情期间消费额增速存在一定的下行,但受消费推移的影响,预计疫情过后会存在一个日用品消费集中的小高峰,能对第一季度的下行产生弥补。总的来看,短期波动不影响消费长期向好的趋势。

投资需求方面,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会受到影响,但在后面三个季度尤其是后半年会大幅度上升。综合来看,疫情过后政府可能会考虑加大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对于房地产投资方面,鉴于当前房地产泡沫较高、风险较大,后期可能以“稳”为主,也就是通过政策调整防止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抑制经济增长。从当前释放的信号来看,新基建投资增速或将大幅上涨,将会成为拉动投资增速上涨的主要支撑。对新基建投资的增加是符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特点的。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粗放式发展刺激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了。针对当前互联网的发展潜力以及“稳增长、促销费”的社会现实问题,新基建投资的加码既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又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净出口方面,随着疫情被控制,以及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后期外贸数据将会有起色,尽管第一季度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而进口并不会受疫情影响太大,加之上年同期进口增速较低,低基数效应也会对进口增速形成支撑。从已经发布的 1、2 月份的外贸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贸易具有较强的韧性和惯性,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逆势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同比增长 1.8%,比重首次超过 30%,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是暂时和阶段性的,随着外贸企业复工复产步伐加快,外贸形势将稳步恢复。

价格方面,CPI 增速较 2019 年有所上行,PPI 增速会止跌上涨。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可以肯定

的是，1月份CPI增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春节错位和前期猪肉价格的上涨。后期，疫情过后，生产得到回复的同时，受政策刺激预计工业品需求可能会上涨。需求相对扩张，带动价格增速上涨，预计PPI增速或将止跌上扬。

对策建议

综上我们对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立场的判断，可以发现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冲击主要是短期影响，尤其是对第一季度的影响较大，长期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较强的韧性和惯性，采取相应的稳增长政策就能够保证今年增速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认为，应采取高强度扩张性政策组合，其中以大规模扩张性需求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大规模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在后续季度中弥补第一季度的经济损失，如消费、投资和企业产出等，以实现全年的经济合理增速。

第一，在货币政策方面，应该充实流动性，同时，引导资金“脱虚向实”，让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采取各种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工具扶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此外，根据经济形势决定后续政策，还应该想办法鼓励直接融资。

第二，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加大财政扩张的力度，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基本建设、教育、研究开发、文化等方面的支出。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转移支付，稳定和提高个人的消费能力，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低保标准等。

第三，鼓励生育。养孩子的成本本身就是消费需求，而且是优质消费需求。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短缺的形势将越来越严峻，为了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必须立即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鼓励生育。因此，这一政策既有助于解决目的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助于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第四，在房地产和汽车消费领域，放松甚至取消限制措施，比如房地产行业的首付过高以及汽车行业的限购、限号、限行等，激活房地产投资和汽车消费。

第五，在供给管理方面，应该进一步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缴费的标准，同时降低各种物流费用、行政性收费等等。

第六，在市场环境管理方面，要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激活市场活力。一是放松各行各业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各行各业。二是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实行所有制中性，让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享受平等待遇，进行公平竞争。三是在农村实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信息网络建设，激活农村投资。四是加强推行依法治国，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公正性、可预见性，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五是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此外，这次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的的影响尤甚。第一季度，在假期延长、返城人员需要隔离期等情况下，相当多中小企业会面临现金流不足的局面。如果这些企业渡不过短期难关，就不利于疫情过去之后经济的恢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由任何一方承担损失都不合理，也承担不起，应该由企业、劳动者、房东、银行、投资者、政府等各方共同分担。我们建议政府可采取进一步的优惠政策帮助其渡过难关，例如贷款延期，缓付甚至减付利息；对中小企业进一步减税，并缓缴、减缴社保费用；由政府出面，协商劳资关系，未开工期间工人工资减少一定比例发放；由政府出面，发布房租减免的建议，建议未开工期间房租减半支付，鼓励房东免除这一时期的房租；建议企业出资人尽量补充流动性资金，保证企业现金流。

“三权分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式的创新

来源：爱思想网(2020-04-19)

作者：顾钰民(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汪艳

2016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以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理念为指导，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权能，培育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指导性文件，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规范集体土地产权关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深化改革的宏观设计。

一、“三权分置”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实践中的新探索

“三权分置”是指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在多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的基础上，以创新理念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改革，为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体土地产权理论的新成果。

中共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农业、农村改革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条件。这是当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农业现代化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为生产力发展创造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需要提供土地制度改革的支撑。在如何实现土地规模经营问题上，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

其一，西方的主流理论和实践认为，土地规模经营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私有，然后按市场规律进行流转，实现土地集中，走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其二，在坚持土地公有条件下改革土地产权关系，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深化、细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村土地在所有权和承包权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离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把农民的承包权经营权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两权，通过经营权的市场流转发挥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功能。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以中国的实践为依据，走坚持集体土地公有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产权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随着现代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不断发展，产权作为法律上的规范属于法律范畴，但它的内涵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的发展变化又以生产力发展为依据，随生产力发展而变化。从根本上说，产权的起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这一分析思路要求对产权的分析必须深入到它的内涵——生产关系以及所有制关系，并追溯到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对产权的界定和所有权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产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产权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概念，基本上不再和所有权作为一个等同的概念来使用。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对产权的理解通常包含以下两方面。

一是产权以经济活动中财产权利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为内容，但以法律形式来表现，或者说财产权利的内容是经济范畴，却以法律形式来确认。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认为：“所有权和所有制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不同范畴：所有制是经济范畴，所有权是法律范畴。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经济制度，所有权是财产归谁所有的法律制度。所有制体现人们在生产资料方面形成的经济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人们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以及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对所有制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实际占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

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

二是产权就其内容来说，是经济主体把自己的财产投入经济活动时所拥有的各项权利，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产权是一组权利，而不是单一的权利。把财产用于经济活动时会产生多种财产权利，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它们都属于财产权利。正是因为产权由一组权利构成，所以才会存在各种权利之间的产权关系，如果产权只是单一的权利，也就不存在产权关系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产权的内涵比所有权概念的含义更为宽泛，所有权包含在产权这一概念之中，是产权内容的一部分。

第二，产权可以分割。产权所包含的一组权利可以分割并被不同经济主体掌握。如果产权不能分割，只能由一个经济主体掌握，也不会存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由产权的可分割性带来的问题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怎样进行产权分割才能更好调动各自的积极性，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率。理顺产权关系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不同经济主体所掌握的不同财产权利怎样和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承担的责任更直接、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把握产权的内涵，既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得到法律确认的制度，是人们经济活动要遵循的基本规则，一种产权关系或产权制度的确立，实际上就成为各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同时，产权又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处理相互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基本规范，一种产权制度的确立就形成了人们相互之间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准确把握产权的上述内涵，是深入理解产权问题的前提，也是研究产权问题应该遵循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认为，由于现代经济活动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资本也采取了社会化的形式，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使现代产权运行呈现的特点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各项财产权利在相分离的状态下运行，就像生产社会化表现为发达的社会分工一样，资本社会化表现为不同财产权利的分离，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也显示出复杂化的特点，为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财产权利和产权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三权分置”改革核心是完善集体土地产权权能

在坚持土地产权公有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土地规模经营。按照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土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但在不同的国情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农业规模经营的模式。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创新模式。农业现代化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土地规模经营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但是，通过实行怎样的土地制度来达到这一目标，各国的道路并不相同。坚持土地公有制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是中国的探索和创造，我们要向世界证明在土地公有条件下走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在实践中显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产权理论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第一，坚持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道路，特别是在总结土地改革经验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土地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这两方面是同样宝贵的。坚持土地集体公有的基本制度，使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充分释放农民生产经营的动力实现了农业跨越式发展是基本经验；负方面的是土地经营权不能流转，和土地承包权不能分离，不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于农民和小块土地结合的小农生产方式。对存在问题的深化改革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三权分置”是在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相分离基础上提出的改革新思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必须稳定，但土地经营权不能固化，要在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进行流转，这是“三权分置”的核心和关键。

第二，突出了以土地资源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为导向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着力完善经营权流转

制度,按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把推动农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模式。把土地经营权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作为目标,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改变土地分割为小块化、碎片化的小农生产方式,实现对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超越。

第三,明确了土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微观动力,重点以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为落脚点,实现农业现代化微观主体的创新。加快培育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微观基础。使专业户和农业企业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中坚力量,实现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微观主体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源,并具有可持续性。

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对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需要生产关系为其创造条件,土地规模经营的基本条件是土地适度集中,在承包经营责任制条件下,主要障碍在于稳定的承包关系和要求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的矛盾。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长期不变,但土地规模经营要求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来实现土地集中,解决的方案是让原来的“两权分离”发展为“三权分置”,在土地产权关系上进一步细分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关系。产权主体也由集体和农户家庭,变为土地所有权的集体主体、承包权的农户主体、经营权的生产专业户或企业主体。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土地产权关系的变化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土地产权关系更具体化,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别按照法律和市场原则进行配置。首先,集体土地按照《承包法》把经营权配置给农户,形成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分离,这一层产权关系是依法进行配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都是法定的权利,任何否定这两种权利的做法都属违法。其次,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即必须在承包者和经营者双方自愿原则下遵循市场规律进行配置,在这过程中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规范和保护双方的权利。再次,三权一旦分置,各自履行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发挥各自的功能,互不干扰。

第二,土地产权权能更清晰,所有权权能是土地的所有者享有的收益权以及法律赋予的其他权利。承包权权能是承包者依法享有的收益权和其他权利,以及应该履行的其他义务。经营权权能是经营者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并承担的生产经营的市场风险。

第三,土地产权关系更规范,所有者只是行使所有权的职能,不再具有承包权和经营权的职能;承包者只行使承包权的职能,不再具有经营权的职能;经营者作为独立于所有者和承包者的一个市场主体,不具有所有权和承包权,只具有农业生产经营权,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专注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三权分置”改革使土地产权关系进一步具体化、清晰化、规范化。《办法》指出:“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根本地位,农民集体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在完善三权分置办法过程中,要充分维护农民集体对承包地发包、调整、监督、收回等各项权能,发挥土地集体所有的优势和作用;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农村集体土地由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不论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非法剥夺和限制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赋予经营主体更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要依法维护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各项权利,使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合理的利用。经营主体有权使用流转土地自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并获得相应收益,经承包农户同意,可依法依规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并依照流转合同约定获得合理补偿。引导土地经营权流向种田能手和新型经营主体。探索更多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有效途径。”《办法》对进一步依法明确三权的内涵,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土地产权制度保障。

“三权分置”的实际内容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关系的改革，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础上，对集体土地产权权能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是为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权分置”现代土地产权的理论。对走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从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农业现代化，把农业机械化等同于农业现代化，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是这一阶段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代表性观点。这一观点虽然比较朴素、直观、简单，没有涉及实现农业现代化体制条件等问题，但符合对农业现代化认识不断深化的发展规律。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从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革的视角来认识农业现代化。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反映了邓小平已经把科学技术、农业经济体制因素、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方式转变等因素都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提出来。进入21世纪，我们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既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问题，更是一个与土地制度直接相关的经济社会发

展结构变化的系统性问题。中共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一思想告诉我们，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其他“三化”同步发展才能真正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这一目标。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看，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与各国的国情和特点相联系的，没有可以照搬的模式。在中国具体国情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涉及的问题和困难更多，具有更大的难度，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认识更符合实际。

在几十年追求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践中，我们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更全面。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在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提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不断创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城镇化获得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内涵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二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三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集中体现。农业现代化的标志一是看农业在国际上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二是看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主要看农业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品牌能力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最主要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只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也涉及到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因素，农业劳动力和土地结合比例直接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如果在小块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制度能否有效为土地集中提供保证，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其重要。实际上不同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的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传统小农生产或现代农业生产，都和不同的土地耕作模式相联系，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土地现有产权关系改革为前提。

建国以来，从农村土地制度三次变革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关系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思路的演变，由此值得反思的是并没有把土地制度改革始终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第一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建国初期的土改。这次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变农村土地封建制度为农民个人小私有制度，带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改革后土地制度的特征是：一方面农民拥有小块土地，使土地所有权高度分散；另一方面，单个农户成为经营小块土地的主体，其经济能力非常弱小，形成了典型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这种状况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二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变革改变了农

村土地制度的性质，奠定了农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集中的问题，但是，土地制度这一变革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农业现代化进程仍然十分缓慢，农民的主体地位被忽视，直接损害了农民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从总体上看，这一持续了20多年的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成功。经验教训是没有解决好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关键问题，没有赋予农民实际的生产经营权和直接的经济利益。这成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直接理论依据。

第三次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改革是对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调整，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把承包经营权交给农户，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分离。这一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是，农户和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小农生产方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又在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一形式中重现。就小农生产方式这一点来说，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与个体农民的小生产方式并没有实质性区别，不同的只是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私有还是归集体公有，但不同性质的土地制度并不能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得到体现。只要是个体农民和小块土地结合的生产方式，就是落后的生产方式。从土地产权制度上看，土地经营权由原来集体统一掌握变为由农户分散掌握，实际上缩小了土地经营规模。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进一步深化农业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对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只着眼于科学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发展并不简单等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要有土地产权制度保障。既坚持农村土地公有性质，又要使土地产权制度符合农业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第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土地制度条件，“三权分置”改革思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土地产权制度的总体设计。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基点的“三权分置”改革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两权分离”在产权关系上的不同点就在于把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了。原来承包权和经营权二权合一由农户掌握，农民作为承包者也是经营者，在土地产权关系上，农民相对于集体组织是另一个产权主体。在这一产权关系中农户是产权主体之一，他的产权权能更重要的是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土地产权关系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生产经营主体也只能是承包土地的农户，由于土地的承包者和经营者不能分离，农户承包的小块土地和小规模农地成为农业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不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

“三权分置”改革在土地产权关系上，形成了土地产权关系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的关系。产权主体由集体和农户家庭两个变为三个。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生产专业户或农业企业。由“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核心是对集体土地产权权能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三、“三权分置”改革落脚点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指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创新是由原来个体农民转换为生产经营组织。个体农户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和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相联系，无法达到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以生产经营组织或企业作为主体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联系，无论是农业生产专业户、家庭农场，或者是农民生产合作社，都已经不同于传统个体农户的生产方式，而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载体。生产经营主体转变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的关键内容，构成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微观基础。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落脚点的“三权分置”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具体在以下几方面要有实际进展。

一是按照“三权分置”要求重新规范土地产权权能关系。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是我国第一次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列入法律保护的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其实质是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而不仅仅看作是一种生产决定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从法律地位上的确认和经济内涵的界定,反映了我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认识的不断深化。“三权分置”以后,要求在法律上对土地产权关系进行调整,对于经营权和承包权的区别及在法律上的界定以及在操作上的实施,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对待和不断完善。

二是在操作层面上把完善经营者产权权能作为重点。经营者产权权能是新独立的一项权能,直接关系生产者的利益。由于我国的地域差别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需要根据不同具体情况制订可操作性的规范。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权与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间接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中间隔了一层承包权,和承包主体已经比较远了,承包权和经营权也已经分离,承包主体和经营主体要通过市场来沟通相互关系。农业直接生产经营者具有怎样的产权权能,对农业生产就具有关键性作用。目前,承包权和经营权权能是合在一起的,经营权权能的内容是什么,和承包权是什么关系,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清晰,更需要在实践中具体的界定。完善“三权分置”需要有可操作性的规范,重点要解决好经营权权能和产权利益。原来集体土地产权权能高度集中于土地所有者手中,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以后,土地产权权能更多地集中于承包土地的农户手中,现在“三权分置”以后,土地产权权能应该更多向经营者倾斜。总之,按照完善土地产权制度,理顺产权关系的一般规律,在产权权能关系上,既要保证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权的权益,更要强化经营权权能,这是现代产权关系的一般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三是在政策层面支持重点要向经营者转移。为给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创造政策条件,对“三农”政策的支持力度重点应向经营者倾斜。“三权分置”条件下,农民的概念主要不再局限于承包土地的农户,而更多是掌握经营权的专业户。土地规模经营是以较少劳动力和较大规模土地相结合,体现了经营主体从个体农民向企业或专业户转换,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经营主体能力提高和经营规模扩大,共同构成农业生产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实际内容。有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构成内容。农业生产领域中直接的受益者应该更多地落实于农业经营者,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三权分置”改革在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上的这一变化必须在政策层面得到体现,产权改革的实际意义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土地承包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在很大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通过流转并从中获得收入的、具有财产性权利的权能,给承包农户带来的是直接财产性收入,而不再是生产经营性收入。

疫情对中国供应链优势的影响

来源: FT 中文网(2020-04-15)

作者: 丁学良(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

【编者按】社会学家丁学良 1992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2003 年,他在香港亲历 SARS,后做过两岸三地对那场重大危机应对模式之比较研究。新冠疫情期间,他在深圳从事全球化及供应链研究。近日他接受 FT 中文网采访,对疫后全球化格局、供应链重组和可能会出现的国家间追责行动,分享了他的见解。以下为整理后的采访实录。

FT 中文网: 你认为这场疫情会终结全球化进程吗?

丁学良: 不能说全球化即将终结。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其实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已经经历过两次重大冲击。

第一波冲击，是由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外迁徙造成的。这种迁徙在 21 世纪初的头几年就已经在发达国家的社会造成了抗争和反弹，只不过还没有上升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外交层面。我记得 03-04 年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经常会讨论产业大转移的问题，有一次哈佛前任校长、经济学家、长期中国观察者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就警告中国，要注意最发达国家中已经兴起的对这一波全球化的严重反应。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吃惊，全球化不是让人人受益吗？廉价商品不是能抑制发达国家的通胀吗？萨默斯说，这只是从你们的角度看到的，发达经济体中大量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社会不满会逐渐开始影响国家决策。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而最近的中美贸易战已经证明了他的警告不虚。

第二波冲击，就是 07-08 年，因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转，导致大量泡沫，泡沫破裂带来一场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

新冠疫情是对全球化的最新一次冲击，不仅影响面更大，把世界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卷进来了，还冲击到了全球化的方方面面。

但是，全球化进程不会终结。首先，疫情总是有季节性的，不会连年持续；第二，最发达国家正在寻找疫苗，目前当属危机最紧张阶段。疫情过去后，不论是原材料、资本、产品，还是人和观念，还是会回到跨越国境的连接之中。

但是，和疫情之前“哪里成本最低就去哪里”相比，疫情之后，所有的跨境连接会考虑一个新的变量，那就是目的地国家在重大危机中是否可靠？这就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了，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生产基地所在国家会不会被下一场传染病扰乱？这个国家的信息是否可靠？与自己国家在政治上的关系如何？

比如说，现在美国研究人士和政界很多人宣称，在疫情之中，中国政府部分控制了一些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中国是很多医疗用品和药品的全球最大的、甚至唯一的生产商。比如，美国出售药品的 80% 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甚至是有些原料药的唯一生产国。以前这类纯粹的经济问题，现在会放到国家战略层面去考虑。比如本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口罩，现在也会被视作战略物资，各国可能会将口罩的生产能力部分从中国迁回本国。

以前美国防范中国，主要集中在尖端武器这一领域；中美贸易战，让民用高科技也被牵涉在内；而这次疫情，会影响到本来被认为是中下端的制造业在中国的布局。这次疫情最直接的冲击就体现在这里。

这就好像正常状态下，你不觉得淡水有多重要，但一旦掉进沙漠中，那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仿佛全球三分之二的人被抛进了沙漠，淡水就变得极其稀缺。

FT 中文网：很多观察者认为，中国已经构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很难搬得走。现在这种看法是否要做调整？

丁学良：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中国建立了虽不是最尖端、但的确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但是，总有个需求问题吧？中美贸易战白热化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很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一带一路”，想要转移出去一部分产能，因为发达经济体不需要这些东西了。疫情之后，除了刚才讲到的供应链迁出的问题，给中国的订单恐怕也只会大幅减少，有完备的供应链又能怎么样？这就好像出租车公司说，我有两百辆车，都是好车，但是街上没人用车，有车又有什么用呢？

FT 中文网：2003 年时你在香港亲历 SARS，这一次则是在深圳观察两岸三地的应对。你如何比较这两场疫情？

丁学良：如果以 2003 年 SARS 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物，17 年来，中国最大一个进步，就是学习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CDC），建立了传染病通报机制。但是，中国的 CDC 不能独立运转，不能独立对公众发布信息，这在我看来，这次疫情最大的教训。

武汉这一次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认为，中国 CDC 系统有很大可能是向上通报了，因为只要在实验室里证明病毒可以人传人了，按照中国政府规定，四小时内必须向北京的 CDC 最高层通报。就算这个通道没有这么畅通，在 CDC 系统内部，专家们可以私下通话讨论。但 CDC 无法干预行政机构最终的决策，也无法召见媒体，必须通过行政部门才能发布消息。

然而，假设武汉的情况最早发生在香港——香港因为曾是 SARS 重灾区，对传染病特别警惕——那么非常可能发生的是，首先，香港的几位传染病专家会密集开会讨论，列出预防措施，并在第一时间通知政府最高层。如果政府认同专家意见，立刻就会进入行政决策和实施；即便政府认为疫情没有那么严重，不同意专家意见，也没有权力禁止专家们见媒体，禁止他们向学生、同僚讲这件事情。这么一来，媒体肯定会跟进，民众会很快得知实情。

传染病系统内部的信息畅通，也非常重要。比如，2003 年遭到 SARS 爆发时，香港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这让他们从此知道，不能完全依赖官方渠道，很多时候要靠同仁关怀，从大陆同僚那里得到信息。所以香港传染病专家在去年 12 月底就得知武汉疫情了，也通报了香港政府。再看台湾。台湾在抗击 SARS 时做得很糟糕，之后汲取了深刻教训。而台湾又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成员，无法参加正式会议，得不到正式渠道传递的消息，只能高度依赖与内地同行之间的交流。12 月下旬，台湾医疗界从内地同行处得到消息后，也已经高度警惕，而且还不那么自私，也把信息返回给了中国大陆官方，因为在大陆的台商很多，这么做有保护台商的心理，几乎在同时，台湾还通知了 WHO——它没办法去 WHO 开会，但可以通过 WHO 的 IHR 机制（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国际卫生条例）联系 WHO，台湾官方还保留了当时发报告的记录。但是，WHO 接到台湾报告后没有给出反馈。

所以说，对中国而言，即使我们有最好的病毒实验室，也有 CDC，但如果这个专业系统无法独立运转——内部得出的结论无法对公众发表，那就无法发挥最大作用。而在国际层面，疫情之后，WHO 的改革一定是重点。

FT 中文网：现在中外媒体上都有关于各国防疫“作业”的比较，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方式是最优的，你怎么看？

丁学良：我不大认同。即便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我们也只能说，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方式中，有些是有效的，有些没那么有效。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即使给定国情，中国大陆也能做的好得多。

举个例子，假如在去年 12 月，医疗系统的警告能及时发布出来，然后迅速对武汉市内的高危人群，比如海鲜市场周围的人群做测试，确诊的甚至疑似的，测出一个送走一个，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比如张家界，在那里建简易房，隔离治疗，那么到元旦之前，大概隔离千把人，也就控制住了。而把受传染者继续留在武汉这么一个千万人的大城市，加上信息又不透明，出现了医疗挤兑，最后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能接受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唯一的最好的。

FT 中文网：民意在这一点上撕裂得很厉害。

丁学良：我也不认为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听到的，就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因为最关键的信息都还没放在桌面上。假如把信息都放到桌面上，我相信绝大多数理性的人会趋于意见的一致，而不会在这些事情上变得过于情绪化。举个例子，湖北籍、武汉籍人士现在在很多地方受到歧视，连九江和武汉都打起来了，但是我现在在深圳，深圳是个年轻的开放的移民城市，很多人学过外语，受过高等教育，深圳市民知道，一旦湖北放开，会有 40 万湖北人来到深圳务工，但深圳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多大的割裂，深圳在做很多准备，欢迎湖北籍的人过来。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民意反映的是 informed public 的意见和判断，而 informed public 就是指公众在应该得到信息的时刻，得到了能够得到的最大化的信息。只有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公众的意见和判断才是真正的民意。

FT 中文网：最近国外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团体，比如律师协会，要向中国追责索赔的报道。你注意到吗？

丁学良：我注意到，有些国家的一些社会团体、宗教团体，企业、智库，在推动向中国追责，但这些行动还没有进入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层面。现在还无法预知会不会有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行动，如果采取行动，还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联邦制还是中央政府制，以及这个国家的法律对于民事纠纷赔偿的规定，不同的国家规定是不同的。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法律政治体系下，即使联邦或者州政府不发起任何行动，也无法禁止社会组织和个人做这件事，而只要有一起赔偿诉讼的官司打成功了，不管赔偿是象征性的还是实际性的，都会大大鼓励其他的组织个人采取同样的手法。

如果出现这类官司，美国法庭即使不能够强制被告方到美国出庭，但它一旦做出了有利于控方的裁决，被告方不出席的话，默认就输了。美国法庭可以找到与被控方有关联的机构或者企业，比如在美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然后进入第二步申诉环节，甚至冻结这些企业机构的资产。美国以前对俄罗斯、古巴和委内瑞拉其实都这么干过。

美国法律还允许集体诉讼，只要有一人出面打官司，就可以在起诉书上把其他所有潜在的受损人包括进去，哪怕连这些人的名字都不知道，而赔偿也是给所有控方的。一定会有律师事务所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这类官司对他们的声誉有很大的提升。可以说，这类官司重要的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它们的象征意义。

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这场疫情可能有三种结局

来源：新华思路网(2020-04-27)

作者：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成员)

从 2020 年元月开始至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逐渐扩大。数以亿计民众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许许多多的行业在疫情影响下也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众多工厂停产、商场停业，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形势严峻，各种危机交织

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灾难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包括超出每个国家政要、经济学家或者是智库研究者的预期。全球每天的确诊人数快速增长，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确诊病例，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伊朗等国疫情严重，经济社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有的人说这场灾难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严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不是战争，但是它对经济的摧毁，特别是对于经济高度联系的经济全球化的摧毁，不亚于一场战争。这是第一个方面，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之广、速度之快，对人类的危害之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当前世界遭受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是几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人的生命危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大宗商品的危机；包括有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而这个经济危机已经超出了以往意义上的那种单纯经济因素引发的经济危机，有可能陷入比 1929、1930 年更为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因此人类，乃至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全球性疫情恶化的影响，最直观地反映全球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

第一，股市熔断。3 月 9 日、3 月 12 日、3 月 16 日、3 月 18 日，短短的不超过十天时间美国股市四次熔断。美国的巴菲特活了 89 岁，在第二次股市熔断的时候说，有生以来经历了三次股市熔断，其中有两次就发生在现在，他说了这句话之后，美国股市又有了第四次熔断、第五次熔断。人们共同见证了美国股市历史上总共五次熔断的四次熔断，而且就在十天之内。全球也有十几个国家股市，陪同美国股市熔断。

第二，油价暴跌。油价从上一轮最高点 146 美元多/桶，接近 147 美元，三月份下降到最低的成交价 18.25 美元，4 月 20 日甚至跌落为负油价，下降到-37.63 美元/桶，一天下跌 300%，世所罕见，闻所未闻。沙特的石油成本是 9 美元到 10 美元，俄罗斯石油成本 20 美元左右，美国的页岩气、页岩油的成本 40 美元左右。现在尽管特朗普在做工作，美国、沙特、俄罗斯三大产油国达成限产协议，但为时已晚。全球疫情严重，正常的生产生活基本停顿，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全球石油仓库爆满，大型邮轮在海洋上游弋。只要不恢复需求端正常需求，石油价格暴跌就不会逆转，所以这是一场全球供给侧的价格大战。石油价格这种暴跌是近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它未来还会有暴涨，如果说美国、沙特、俄罗斯为了各自的利益妥协、谈判的话，如果全球战胜疫情复工复产复市，恢复人的正常往来，未来几个月石油价格还会暴涨，所以，石油暴跌、暴涨，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市场急剧动荡，这是超出所有人预期的。

第三，“货币贬值”或者叫“流动性泛滥”。美国在第二次股市熔断的时候，连续两天每天向股市注入 5000 亿美元的流动资金，3 月 17 日利率下调到零利率，同时，实行 7000 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3 月 23 日，美国推出了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加快了印钞的速度，加大了印钞机的工作量。美联储实际上成为商业银行，要买断所有的市场需求，它从一个央行的角色，变成了一种商业性的“接盘侠”。而且，在美国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欧盟、日本等 35 个国家立即跟进，加上去年已经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已经超过了 40 多个国家。所以这一轮的货币宽松或者是货币注水，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潮，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零利率、负利率的国家现在也超过 40 多个。全球负收益率债券去年已经达到了 17 万亿美元，其中去年一年增加了 4 万亿美元。

第四，债台高筑。全球的债务总规模现在累计已经超过 250 万亿美元，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超过 23 万亿美元。美国已经批准了 2.15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且今年肯定不止是推出 2 万亿美元救市计划，未来还会继续推出巨大规模的美元救市计划，政府的债务会大幅度增长。现在美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没有空间了，零利率再下降就是负利率，所以只能靠财政政策，只能靠大规模借债。

疫情过后，世界更新演化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人们在灾难中思考、在灾难中提出问题。人们最关注的是疫情对世界未来产生的影响，何去何从。

首先，这场疫情可能会使人们产生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共识。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同处地球村应该守望相助的理念、人类必须携手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像这样的理念，将会成为 21 世纪的人类新文明，它将凝聚全球向往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和人民的共识。

全世界还会有一个重新的思考。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大变局中的正向的、积极的变量变

成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强大力量。而不是放大现在我们遇到最大挑战，即有的国家把一个国家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采取霸凌主义，维护霸权地位，不惜向其他的国家动用经济制裁、武装侵略、诽谤讹诈一系列卑劣手段，甚至发动战争。

其次，这场疫情最终的结局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全球能够合作，共同抗击疫情，救助经济，那么可以避免经济持续的经济大衰退甚至经济大萧条。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些国家仍然不合作，或者口头上说合作，但实际上利用疫情加大对其他国家的制裁、围堵、遏制、讹诈，还要把其他国家踩在脚下，想要永远保持伟大、保持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将陷入分裂，经济也会进入大萧条，可能会比1929年、1930年还要严重。第三种情况，我们设想新冠病毒也许像SARS一样来势凶猛，但是突然消遁，人类面临的这个灾难，侥幸过去了，重新振兴或者复兴世界经济，全球走向合作，世界经济转好，但这种情况取决于病毒什么时候消遁。病毒自然消遁是有可能的，但是，人类要战胜病毒如果仅仅靠疫苗的研制，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世卫组织、美国的权威专家和中国的几位院士都已经表示，研制疫苗需要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一年到一年半才会有疫苗，才能投入应用和预防。我们必须指出，即使研制出疫苗，也无法立即对患者进行救治，但是人类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救治，是如何减少疫情对人的生命的威胁和危害。

第三，这场疫情之后，人们对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国家的组织行动能力，国家和世界的公共卫生的体系，对人的生命价值、生活的价值、地球和人类的关系都会有重新思考。比尔·盖茨最近有篇文章写得很好，他也是从这些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深度的关于人的生命的思考。这场疫情会使更多的人陷入生命的思考，从而使未来人的生命更有价值。

第四，从一些国家疫情之前和疫情期间的所作所为来看，有些国家虽然貌似强大，但是在强大的华丽的外壳下面，正蔓延着像新冠肺炎病毒一样的“政治病毒”。而这种“政治病毒”的侵袭，可能会使这些国家真正走向衰落。比如说大国信用的崩塌，用一个国家法律法规去制裁其他国家，用流氓手段、战争手段、金融手段去转嫁经济危机、转嫁国家信用危机、转嫁国内矛盾。这些所作所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看在眼里，如果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可以为所欲为，按照这一套办法行事，无异于在给自己掘墓，多行不义必自毙。

第五，全球的治理、全球的规则、全球的标准、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相处的方式会被重新思考，会形成一些新的共识或者规则，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着合理的发展方向。

最后一点，从中国经济上来说，疫情过后可能会使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产业链重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方向、贸易流量发生改变。

疫情还会使我们在疫情中看到自己的短板，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加快补短板。疫情之前，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核心零部件、高端、上游关键环节上的短板，在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上的短板。在这些方面，中国会更快地补短板，以适应整个国际经济、政治、外交格局演化，适应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外交格局的演化。在全球这种深度演化中，中国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新闻快讯

综述：数据显示封锁措施重创英国企业 经济陷入“数百年”来最严重萎缩

来源：路透中文网(2020-4-23)

作者：Reuters Staff

路透伦敦 4 月 23 日 -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委员弗利葛(Gertjan Vlieghe)周四表示，英国可能陷入数百年来最严重经济滑坡。本月，为遏制新冠病毒疫情所采取的封锁措施对企业造成的打击，甚至超过了最悲观的预测机构所担心的程度。

弗利葛周四表示，一旦疫情大流行结束，经济应该会恢复到新冠病毒爆发前的增长模式，但这可能需要时间。

早些时候公布的调查显示，在政府与一场逾百年来最大公卫危机作斗争之际，经济几乎已肯定陷入历史性萎缩。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 17,000 名英国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英国财政部周四表示，仅未来三个月政府就需要发债 1,800 亿英镑(2,230 亿美元)，为防止经济崩溃而采取的空前举措筹资。

“根据早期的指标，以及其他比英国稍早遭受打击的国家的经验，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比过去一个世纪、甚至可能是几个世纪所见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快、更严重的经济萎缩，”弗利葛表示。

他在一次在线演讲中指出：“目前，经济潜力遭到严重破坏，但一旦疫情结束，且其它因素不变，原则上经济应回到与疫情爆发前近似的轨迹。”

“当然，所有的风险是，这将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看起来更像 U 型，而不是 V 型复苏，”他说。

IHS Markit/CIPS 的月度英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出经济受损的程度。

该指数从 3 月的 36.0 急降至 12.9 的纪录低位，甚至远逊于路透调查中分析师的最低迷预估 31.4。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也类似。

荷兰国际集团(ING)经济学家 James Smith 表示：“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他预计英国经济最早也要到 2022 年才能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规模。

另一项调查显示，制造商对前景的信心达到了 1950 年代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悲观水平。英国工业联盟(CBI)的企业乐观指数从 1 月的正 23 骤降至 4 月的创纪录低点负 87。

路透对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季度经济萎缩约 13%，为二战后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

数据公司 IHS Markit 表示，其数据引发了人们对封锁成本和持续时间的质疑。

Investec 经济学家 Victoria Clarke 表示：“这些印在冰冷的纸上的数字和报告的产出降幅发人深省。”

原油价格战走向落幕

来源：日经中文网(2020-04-13)

作者：岐部秀光

以沙特阿拉伯为中心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与俄罗斯等未加盟产油国构成的“欧佩克+”在北京时间 4 月 13 日凌晨举行的紧急电视会议上，就每日 970 万桶这一罕见的联合减产最终达成协议。欧佩克+将以此为基础，推动美国等其他产油国一同承担每日 300 万~500 万桶的减产。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导致的经济急刹车，世界原油储备能力接近极限，在此背景下，主要产油国转向合作。

此次联合减产出现了很多罕见的状况。在过去的欧佩克和欧佩克+的会议上，一直就每日 200 万~300 万桶的产能压缩展开激烈斗争。而此次达成协议的减产则达到匹敌俄罗斯和沙特现在产量的罕见规模。

沙特和俄罗斯在 3 月的磋商决裂后，上演了明显相互推卸责任的揭短大戏。但是，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导致的史无前例的需求减少再次将两国拉回到生产同盟。

沙特的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预定 4 月 13 日发布 5 月交付的官方销售价格（OSP）。4 月的 OSP 大幅降价成为导火索的“价格战”预计走向终结。

沙特等希望以欧佩克+的协议为基础，推动美国等提供协助。挪威和加拿大已显示出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沙特国王萨勒曼似乎已在欧佩克+的最终协议后通过电话确认了合作。

但是，即使进行罕见的联合减产，也难以阻止原油的供应过剩。因为目前存在每日 2000 万~3000 万桶的供应过剩。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力和致死率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难以预测危机何时结束。如果全球经济的正常化被拖延，产油国将不得不讨论减产的强化。

能储存原油的设施包括产油国在各地拥有的储备油罐、管线和冶炼设施等。如果储存的能力超过极限，石油市场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产油国和贸易商将不得不花费成本，将租赁的海上油轮用作储存设施。亏本的产油国将只能停止生产。如被迫停止设备运行，存在油田的可开采年数缩短的风险。生产的重启也伴随成本。

一部分产油国为了让业者收走过剩的原油，需要支付手续费。由于原油的种类不同，价格有可能转为事实上的负值。

产油国的团结也并不牢靠。沙特描绘的前景是，在 9 日的欧佩克+会议上敲定每日 1000 万桶的减产，在接下来的 10 日在自身担任主席的二十国集团（G20）能源部长会议上取得美国等的协助，发布每日 1500 万桶的实质减产。

但在欧佩克+内部，墨西哥在最后关头拒绝接受协议，这对 G20 的讨论产生了影响。为应对油价走低而签署了期权协议的墨西哥表示，与并未积极做好准备的其他产油国同样被迫减产是不公平的。结果，不得不下调整体的减产量。

在能源的净进口国较多的 G20 之中，对于强调产油国利益的声明，消费国似乎也发出了担忧的声音。

《焦点》美国股市大反弹的背后： 大型科技股过度受宠令人不安

来源：路透中文网 (2020-4-21)

作者：Reuters Staff

路透纽约 4 月 21 日 -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打击经济，股市自上个月低点以来的戏剧化反弹似乎也越来岌岌可危，投资人再度将买盘集中在少数科技股及网路股上，凸显了这样的疑虑。

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 (BofA Global Research)，光是微软 (MSFT.O)、苹果 (AAPL.O)、亚马逊 (AMZN.O)、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GOOGL.O) 以及 Facebook (FB.O) 这五档股票，就占了标普 500 指数市值的 20% 以上。该行分析师指出，对于大型股投资的密集程度比 2000 年网路泡沫时还严重。

截至周五，资讯科技类股 .SPLRCT 占标普 500 指数 .SPX 比重达 25.4%，远高于其他十大类股，也略高于 2 月 19 日标普 500 指数创下历史高位时的水准。

这些企业的财务实力及业务模式强劲，有望安然度过这波疫情，是其股票在过去几个月的市场激烈波动中能够受到青睐的原因。

但头重脚轻的市场在一些部分投资人眼中也让人忧心，特别是标普 500 指数自 3 月低点大涨 26%，让人越来越担心股市已经超前经济基本面太多，目前美国经济工作岗位还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流失，且企业获利正在恶化。

少数几只股票领涨大盘指数，或许也能说明投资者对市场其他板块能否在未来几个月安然无恙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股市转跌可能促使投资者抛售涨势良好的股票，锁定其中的获利，从而导致更急促的跌势。

“如果市场决定再度回撤，重新测试那些低点，那大家会对获利最丰厚的股票进行获利了结，”嘉信理财首席投资策略师 Liz AnnSonders 说。

据标普道琼斯指数的资深指数分析师 Howard Silverblatt，截至上周五，亚马逊、微软和 Netflix (网飞) (NFLX.O) 一直是今年迄今对标普 500 指数的股东总回报贡献最大的股票。

网飞股价今年迄今上涨了 35%，亚马逊涨了近 30%，微软上扬了 11%。

与此同时，研究公司 Bernstein 的一项分析显示，科技股和网络股是投资者持有最多的股票。市场的五大重仓股是微软、亚马逊、Alphabet、Visa (V.N) 和 UnitedHealth (UNH.N)。Bernstein 的分析使用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和价格动力等因素。

“市场在 2 月时投资范围过窄，太过集中于科技股。现在更是如此，” Miller Tabak 的首席市场策略师 Matt Maley 说。

“在市场容易受到打击之际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因为人们在整个市场找不到太多有价值的股票，因此他们买入认为有很大投资价值的少数几只股票，” Maley 说。

在其他市场出现紧张之际，例如油价周一就跌至负值区域，投资者也在关注股市疲软的迹象。金融分析公司 S3 Partners 的数据显示，SPDR 标普 500 指数 ETF Trust (SPY.P) 的空仓上周升至 2016 年 1 月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准。

对一些投资者来说，科技股和其他互联网股票有吸引力说得通，尤其是在市场及经济前景都不确定的情况下。

“对很多人来说，如果现在还有任何增长的话，也会是在科技领域，所以会继续将资金投入 to 这些股票中，认为该领域增长会更快，” Horizon Investment Services 执行长 Chuck Carlson 称。

虽说科技股表现优于大盘，但其他一些领域的股票也有较好表现，尤其是医疗保健、SPXHC 和必需消费品、SPLRCS 这两大传统防御类股。

“科技股从来就没被看作是‘防御’类股，不过考虑到其在这次全球疫情期间的良好表现，或许应该作此考虑，” Bespoke Investment Group 在一份报告中称。

抢时间补进度稳经济举措多路并进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0-04-14)

作者：孙韶华

二季度伊始，多部委和多个省市都开始密集召开会议、研究推进稳经济、扩内需系列举措，其中，重大项目投资成为重要抓手，全力以赴抢时间补进度，多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推出一揽子举措力促项目进展顺利。业内预计，二季度，相关政策效果将开始显现，助力经济稳定增长。

近日，地方重大项目迎来集中开工。贵州省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日前在 9 个市州同步举行，集中开工重大工程项目 583 个，总投资 1450.90 亿元。据悉，本次贵州省集中开工项目聚焦基建强基础、聚焦产业增动能、聚焦民生补短板。其中，5G 等新基建项目 49 个、总投资 104 亿元；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项目 52 个、总投资 163 亿元；公共卫生、大健康等项目 28 个、总投资 104 亿元。

福建省发展改革委日前筛选推出 248 项 2020 年度福建省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 5978 亿元。其中，三大主导产业项目 41 项，总投资 996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69 项，总投资 2712 亿元。

在 4 月的第一天，黑龙江省全省 13 地市同步举行百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标志着今年黑龙江省“加强版”百大项目建设正式拉开序幕。据悉，今年黑龙江省百大项目总数达到 500 个，比去年增加 390 个，总投资超过 1 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超过 2500 亿元，总投资、年度计划投资均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此外，还有包括江西、海南等多地都在近日集中开工了一批重大项目。地方纷纷聚焦关键领域全力以赴加快推动实施重大投资项目，稳定有效投资，提振地方经济。同时，还推出一揽子举措力促项目进展顺利。例如，《上海市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推进重大项目开复工、扩大政府有效投资、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等四个方面，推出 20 条具体政策措施。

不仅是投资，促消费也成为地方稳定经济的重要举措。不少地方采取发放消费券的方式，还有地方提出促消费的一揽子举措。例如，四川省日前出台《关于做好激发消费潜力稳定经济增长的通知》针对性提出包括“重启夜经济”等在内的 24 条促消费措施，助力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

地方举措接连出台的背后，旨在力争将疫情对经济影响降到最低，稳定经济增长。事实上，二季度以来，从部委到地方，已经密集召开会议研判经济形势、部署经济工作。

4 月 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秘书长丛亮主持召开部分地方经济形势视频座谈会，围绕

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与走势、面临的问题和有关政策建议，与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广东省、四川省、陕西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在 3 月底主持召开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专家座谈会，就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应对政策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建议。

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 1 至 2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4.5%。不过，业内指出，随着政策的推进落实和疫情的有效控制，我国投资将逐步回归常态，投资活力将进一步激发，有效投资需求将持续释放，投资有望逐步恢复向好，企业复工复产积极有序推进，经济运行加快回归常态，疫情冲击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志刚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各部门就投资、消费、就业、财税等出台了众多政策，和以往的刺激政策不同，这些政策更多地体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构筑起一道经济社会运行的网络，减少经济因疫情遭受的损失。

“二季度和三季度是影响全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目前，二季度伊始，地方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的稳投资和稳经济举措，纷纷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政策，包括推动新基建、发行消费券等政策，政策效果会随着国内防控形势的好转而逐步显现。”王志刚表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范若滢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随着复产复工进程加快、效率提高，预计二季度相关政策效果将开始显现，二季度经济增速将恢复至正增长区间。但考虑到全球疫情的蔓延，我国疫情防控仍面临“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压力，预计二季度经济的恢复程度有限。全球疫情形势拐点未至，给经济恢复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预计经济真正企稳与恢复仍需等到今年下半年。

对于下一步的政策建议，王志刚认为，要以救助重点人群和重点企业为主，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数字科技实现政策的精准定位，让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生活能够稳定下来，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变化，加大政策统筹协调，让复工和复产能够同时启动，在外需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候，更多的政策要转向内需，提高投资的效率和对就业产出的带动效应，同时优化消费的软硬环境来稳定居民消费信心。

范若滢表示，为应对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压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发力稳增长关键领域。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加大专项债与重点项目、新型基建项目的对接；适时考虑特别国债的发行。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总量+结构”并重，降准、降息仍有必要。三是进一步出台稳消费政策，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培育壮大生鲜电商、在线教育等新型消费；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措施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综述：美国第一季 GDP 或创逾 10 年最大萎缩幅度结束纪录最长扩张期

来源：路透中文网 (2020-04-29)

作者：Reuters Staff

路透华盛顿 4 月 29 日 - 因减缓新冠疫情蔓延的严格举措几乎封锁了美国，其第一季经济萎缩幅度可能创大衰退以来最大，从而结束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预期降幅将反映 3 月最后两周的经济活动下降,这两周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申请失业金。商务部周三公布的 GDP 初值将支持分析师的预期,即美国经济已经深度衰退。

“经济在直线下降,我们可能逼近比深度衰退糟糕得多的局面,”洛杉矶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商业经济学教授 Sung Won Sohn 表示。“现在谈论复苏还太早,我们将看到大量中小企业破产。”

据路透对分析师调查,美国第一季 GDP 环比年率或许萎缩 4.0%,因消费者支出大幅下降,企业库存减少。

这将是 2009 年第一季以来的最严重萎缩。企业投资下滑的加剧可能是上季度萎缩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这些拖累因素可能盖过了进口减少、楼市以及政府开支增多等积极因素的影响。

调查中对 GDP 的预估值最低为下滑 15%,这将创下有史以来最深度下滑。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曾国平称,从 3 月 19 日美国部分地区开始实施抗疫封锁,到 4 月 15 日期间,美国 GDP 缩水近 1.2 万亿美元,经济产出较上年同期下降 26%。

在全美抗疫封锁期间,很多工厂以及餐馆和其他社交场所等非必要企业不得不关停或进行低位运营。

“对于改为在家办公的员工来说,劳动力投入保持在 100%的可能性很小,”曾国平称,“员工还必须兼顾育儿、家庭教育和更多的压力。这两方面的限制都表明,我们的预估可能还会偏向下行。”

预期 GDP 萎缩,连同创纪录的失业人数,可能让各州及地方政府重启经济的压力更沉重。

这可能也给 11 月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更大的麻烦,之前外界就批评白宫起初对新冠疫情的反应缓慢。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新冠病毒确诊感染病例已经超过 100 万例。

“我们遭遇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冲击。”特朗普经济顾问哈西特周二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我们需严肃以对。”

美国国会已批准一套约 3 万亿美元的财政方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已降息至接近零的水准,并大大地扩大了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但经济学家说,这些措施并不充分。

他们认为,即使重新开放地区经济,使整体经济回到疫情前水平也得花上好几年时间。他们预计第二季 GDP 萎缩程度将更大。目前已有一些州正在重启经济。

未来还将面临更多痛苦

“第二季经济势将收缩近 40%,”RSM 首席经济学家 Joe Brusuelas 说。“重要的是,我们谈到的重启经济,并不是立马一步到位。肯定不会是从零到一或者按下开关就启动。企业正在开张,但仍会受到公共卫生政策的严重限制。”

重启经济也带来出现二次疫情和再度实施封锁的风险。

分析师相信,美国在 3 月下半月社交疏离措施生效时就陷入衰退。

关于美国经济衰退问题的权威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并不是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将实质 GDP 连续两季下滑定义为衰退,而是观察经济是否普遍存在活动下滑并持续数月下滑的情况。

“NBER 可能暂时给不了我们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正在全面开始呈现严重深度衰退的所有特征,”NatWest Markets 的首席经济学家 Michelle Girard 说。

在美国经济活动中占逾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支出第一季预计已下滑 17%,而去年第四季消费者支出

还在以 1.8% 的速度增长。

GDP 的其他组成部分可能跟前一个季度一样疲弱。

尽管进口下降帮助缩减贸易逆差并为上个季度 GDP 带来至少 2 个百分点的贡献，但这可能意味着没什么库存累积。根据摩根大通，第一季企业库存可能减少 300 亿美元，第四季为增加 131 亿美元。

企业投资可能连续第四个季度萎缩，受设备和采矿等非居住建筑支出下降拖累。特朗普政府发动与中国的贸易战、油价下跌以及波音 (BA. N) 问题已经导致企业投资承压。

房地产市场上个季度可能加速，但动能似乎在 3 月已经消退。政府支出料温和增长。

大多数分析师认为经济不会快速反弹或出现 V 型复苏，并称很多小企业将消失。他们还预计 3 月中旬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约 2,650 万人中有一些可能将找不到工作。

“我认为不会出现 V 型复苏，而是会出现 J 型复苏，” RSM 的 Brusuelas 表示。